

## 緒論： 第二媒介時代？

近幾年來，對於「網絡空間」(cyberspace)的廣泛討論，讓我們注意到這樣的新概念：媒介研究應該減少對訊息的關注，而將焦點轉移至作為社會環境形式之一的傳播科技(Meyrowitz, 1999: 51)。

1

一九九〇年代，伴隨著所謂「網際網路革命」(Internet Revolution)而來的是對於網絡空間探討的廣泛流傳。早在此之前，就已出現由舒禾治與懷特(James Schwoch and Mimi White, 1992)所撰寫的「學習電子生活」(Learning the Electronic Life)一文，他們著手描繪一個典型美國家庭的日常活動，文中描述身為教育界中的老師，從早晨醒來，他們奉獻時間忙碌著，直到晚間才得以休息。

兩位學者寫道：在黎明破曉時，他們被連接於自己與兒子臥室之間的嬰兒監控器喚醒。接著，他們使用微波爐將麥片加熱。當他們的兒子在遊戲圍欄中，舒禾治與懷特操縱著遙控器，在電視機前做些運動。

如果不是工作天，我們會離開房子、進入車內，再用

自動開關器將車庫門放下，開車出去辦事情。接著，在銀行或是附近的自動提款機停下來，提領一些現金，用於日常用品和購物(可以使用現金、支票，和信用卡，透過當地電腦網絡取得初步的電子認證，再透過全國性的電腦網絡取得後兩項認證)，接著返回家中。前往辦公室或上樓使用電腦專心工作之前，先確認電話答錄機。若是平常的工作天，則不僅有個人與學生、同事的互動，還包括透過遠距電話、影印文件、電腦輸出資料、硬碟、電腦程式、數據機、電子郵件、軟碟機、錄音與錄影帶的互動，有時則透過傳真來取得聯繫。如果我們不必工作到晚上，那麼一般夜晚可能會(伴隨著來回往返的電話)收聽廣播、錄製好的音樂(唱片、錄音帶或光碟)，收看無線電視、有線電視或錄影帶。當然，最有可能的情況是上述選擇的結合，過多的夜間電視節目，使人們墮落地躺在舒適的沙發上，無意識地使用遙控器快速地切換頻道。嬰兒監控器傳出寶寶熟睡的聲音，在每個夜晚陪著我們上床入睡。如此循環著，伴隨著輕微程度的變化，隔天又再度重複一次 (Schwoch and White, 1992: 101-2)。

- 2 舒禾治與懷特將這些互動描述為「不值得注意的一連串事件」，因為「少數人對於科技某些方面的快速、便利，已經不感到驚奇：電訊傳播是以電磁波頻譜為基礎，以及各種電纜建構而成的電訊傳播網絡，像是電話，它就成為我們日常經驗中的一部分」(Schwoch and White, 1992: 102)。舒禾治與懷特主張，這些科技之所以會如此重要、強大，是因為它們被用來聯繫彼此。人類與科技之間的聯結，完整的科技能力教育已被培養，也就是將數千種不同的習慣和例行公事融合在一

起的教育。在這資訊社會中，科技幫助我們、聯繫彼此，但同時也將我們囚禁 A

生活在資訊社會中的人們，不只接觸並「使用」資訊與傳播科技；除此之外，他們的行為模式更被這些科技給框架、限制住了。自從舒禾治與懷特發表了他們的論文之後，一直到七年後矽世紀(silicon century)的來臨，這段期間內，大量的互動性傳播科技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變得有意義。關於這些互動性傳播科技，我們可以加入以下情節：數位化、光學纖維、封包轉換等技術的出現，使網際網路得以實現。同時衛星傳播以及衛星電話、全球化定位系統等資訊裝置也隨之普及化(參見 Dizzaed, 2000)。而我們多半不曾注意到這些技術系統擴展出最簡單的活動：在千禧蟲(millennium bug)、令人恐懼的千禧危機(Y2K)期間，這樣的忽略適時地成為億萬美元焦慮的縮影 B

但是，缺乏警覺並不代表我們會變得資訊、影像或科技「超載」(overload)，就如同「飽和」(saturation)這篇論文的作者所主張的 C 媒介飽和助長非媒介經驗的觀點，此種經驗被非個人層次的媒體入侵所威脅。事實上，在本書中我們將會看到，媒介的附加價值可以是個人化的，而且如同具體化關係一般有意義，這要感謝這些附加價值帶來的好處，它需要一個廣泛的概念：「網絡空間」(cyberspace)。

以現象學的層次來說，傳播資訊科技(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CITs)網站的數量劇增，扭轉了我們原本對於「客體」(objects)的認識，在某種程度上也改變我們對

---

A: 這也是為什麼舒禾治與懷特著重於分析「美國文化中，科技決定論的教育」的原因。

B: 學習電子化生活的過程，以及日常生活的重要性，都是本書最後一章「電訊傳播」裡將回過頭來討論的問題。

C 此主張是同時為了傳統的「影像」(參見 Gitlin, 2002)和新媒介(參見 Postman, 1993; Virilio, 2000)所作。「飽和的自我」(saturated self)的概念核心也是如此(參見 Gergen, 1991)。

他人的瞭解 D 面對面關係被傳播科技終端的電腦介面所取代，電子設備因而興盛起來。在我們的身體之外，整個世界充滿被賦予生命力的客體，這些客體擁有的生命力足以與人類競爭，如同特寇(Sherry Turkle)所言，我們應該將電腦螢幕視為「第二個自我」(second self)(Turkle, 1984)。當非人類可能與人類競爭時，人們逐漸發現到，自己成為社會脈絡的一部分，而在社會脈絡之中，人類正被「客體化」(objectualized)

- E 許多研究曾經以這些現象為題，結果顯示，人們對於媒介與傳播科技有著高度的依賴。人們必需開著電視當作背景聲音，即使他們並不是真的在看電視，網路使用者必須收發電子郵件，許多人們則透過持有行動電話而找尋安全感，即使他們很少使用它。
- 3

當然，我們與客體系統的介面接觸成為明確的社會關係之後，新傳播與資訊科技中的關係在時間和空間上便得以「延伸」(extended)(參見 Sharp, 1993)。同時，它們延伸的方式本身也可以被視為一種關係。透過「前科技」(pre-technological)或前虛擬關係的延伸機制，新傳播與資訊科技擁有自主的能力，即使在某種程度上它們可能以某些方式取得與原本不同種類的關係。

本書認為這些電子化延伸的關係是由它們本身擁有的「能動性」(dynamics)所建構而成，能動性除了複雜的物件技術陣

---

D: 參見諾爾塞蒂娜(Karin Knorr-Cetina, 1997)所寫的創新性文章：後社會知識社會中的社會關係 (*The Society with Objects: Social Relations in Postsocial Knowledge Societies*)。諾爾塞蒂娜提出「社會的盡頭」(end of the social)論點，這指的是「客體化」(objectualization)的過程。客體逐漸地取代理人類而成為我們的關係夥伴，並深植入環境之中。或者，它們連結、中介越來越多的人類關係，使得人類依賴著物件。「客體化」這個詞彙正是我建議必須關注的情形。

E: 資訊社會中，親屬關係和面對面關係的強度大幅度地減弱。家庭規模逐漸縮小，獨居的人們則越來越多。但是，就像舒禾治與懷特所舉的案例一樣，即使是核心家庭，都逐漸地具有科技性中介的特質。

列之外，還有其它可研究之處，由於它們特有的能見度，使得許多社會關係能夠在無形的狀態下進行。

尤其，社會能動性將會以此基礎被分析：它們可以被當作社會整合技術性延伸領域的一部分來分析，包括廣播整合和網絡整合。本書最後，我將針對這些類型的整合，證明它們在本體論上是有差異的，也就是外在實體的差異性，而不只是理論上的差異。同時，這些不同類型的整合也是相互建構的。

## 壹、網絡文化中的傳播

舒禾治與懷特描述的科技革新都市背景，在日常生活脈絡中逐漸變得稀鬆平常，並主導了現代傳播的進程。傳播並不會在真空狀態下發生，也並非在同質化情境、或是只靠自然語言要素的力量產生。傳播是建築、城市、科技、社會形式所形成。

本書探索這些情境脈絡的相互關係，並描繪出一系列的傳播事件。本書談論所謂「資訊」社會之下的情境脈絡、不同情境脈絡之間的關聯性，以及傳播本身的可能性。在舒禾治與懷特的日常生活經驗中，關於城市和微型城市的真實狀況描述，詹姆斯的日常生活經驗為瞭解當代傳播的過程不可缺的一部分。傳播資訊科技使用的增加，以及美國、澳洲、英國等地獨居人口的增加，兩者之間是否具有關聯？購物中心等公共場所的私人化，以及對於廣播、網路媒介的依賴，這兩者之間是否存在著邏輯關聯性？

近十年以來，城市生活的科技與新傳播科技之間的匯流越來越明顯。這種情況甚至導致一些評論家認為世界情境脈絡的私有化集中，它們的電子化、結構或是自動導向，實際上也等同於「網絡空間」(cyberspace)。這種匯流或許不比網際網路所呈現的那麼強烈，但它本身就是一個網路，也是「網絡空間」

關係的模式 F

4 二十世紀的最後十年裡，全球性互動科技出現，例如網際網路，使得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日常生活領域中，傳播媒介的本質與範圍產生劇烈轉變。這些改變象徵著「第二媒介時代」(second media age)的來臨，被視為是一種廣播形式媒介主導地位的轉移，而這些廣播形式媒介如報紙、廣播和電視。很明顯地，第二媒介時代的來臨，幾乎完全是以互動性媒介為主，尤其是網際網路，而非沒落的廣播電視。一些人以過去經驗指出，大眾廣播技術形式的衰落或分眾，將有利於「小眾市場傳播」(參見 Marc, 2000)，雖然這並不常被認為與互動性傳播的發展有關聯，而第二媒介時代的典型代表是互動形式傳播的快速發展。「第二媒介時代」這個稱號的正式確立，是否巧妙地暗示著「第一媒介時代」的死亡？在本書中，這個論點備受爭議。當然，「第二媒介時代」這項論點說明了這樣的見解：在媒介高密度的國家、地區中，媒介景觀明顯產生改變。但是，新、舊媒介之間，兩者連結和分裂的關係，是同樣重要的。

然而，「第二媒介時代」的來臨有兩項重要結果：實質面與理論面。本書概略描述「第二媒介時代」所帶來廣泛又複雜的實質結果，意味當代社會的整合。第二媒介時代的理論性結果是：傳統媒介研究所強調的廣播媒介之社會學意義，這樣的概念必須徹底修正。

---

F: 在本書中，「網際網路」(the Internet)這個詞彙指的是自從一九九一年以來，全球性標準化的「網中之網」(network of networks)。雖然，許多其它類型的電腦中介系統逐漸發展，如網路聊天軟體 (Internet Relay Chat, IRC)、電子郵件、新聞群體、電子佈告欄、多人網路空間 (MUDs)、(MOOs)等，但是，嚴格來說，這些電腦中介系統都是網際網路的一部分。如威爾曼和茱莉亞(Wellman and Gulia, 1999: 189 n. 3)指出，它們正快速地與網際網路結合。

## 貳、語言學觀點對媒介的誇大言論

在文化研究的影響之下，自從一九七〇年代以來，傳統的歐洲媒介研究比較著重於內容與再現，而非「形式」(form)或「媒介」(medium)。或許這是對於美國發展的「傳播過程」模式中，媒介效果(media effects)和行為認識論的反彈<sup>G</sup>

運用語言的觀點來分析媒介內容，始於馬克思主義者對意識型態的概念化，此後，受到符號學(semiotics)、解構論(deconstruction)和新批判主義(New Criticism)的影響，語言學被認為是研究文本和論述意義的方法，同時語言也是「大眾」媒介影響文化價值和個人意念的方式。一九七〇、一九八〇年代期間，各種研究文本的取徑之間爭論著社會再製的問題，以及主導性論述的「主流意識型態」(dominant ideology)如何與更廣泛的社會形態產生關聯<sup>H</sup>。在語言學典範的庇護之下，媒介研究也將關注從「媒介」(media)轉移至媒介內容(medium)：文字

---

<sup>G</sup>當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所發表的一些論文，例如霍爾(Stuart Hall, 1980)這篇深具影響力的論文：製碼與解碼(Encoding/decoding)，被視為是不同於傳播過程模式觀點的批判。接著，霍爾闡述他在列斯特大學(Leicester University)所發表的第一篇論文，傳播研究明顯地被過程所主導(Hall et al., 1994: 253)。

<sup>H</sup>關於馬克思主義者和後現代形態媒介研究之間的這項爭論，雖然兩者皆同意論述的重要性，但兩者的分析各自有著不同目的。馬克思主義者的興趣在於，社會整體的再製中意識型態所扮演的角色為何。而後現代主義以本體論的觀點出發，將論述本身視為一種脫離社會整體的事件。馬克思取徑對於社會學的價值在於指出語言學典範的限制之處。直到一九九〇年代，克里斯多福(Christopher Williams)問道：「意識型態這個名詞變得毫無希望、老舊不堪，難道這不是已定的事實嗎？」(擷取自 Coner, 1997: 453)。的確，面對新媒介的來臨，儘管馬克思取徑曾經在媒介研究位居核心角色，但如今它已經無法發揮巨大影響。

書寫、影像、動畫、音樂、演說的文體，多過於這些制度化營運的廣播、網路媒介<sup>l</sup>。媒介研究是與文化研究相關的一門學科，不斷探討認同（個體和「主體」(the subject)）的問題，同時也探討權力、意識型態、社群內巨大的語言模式、理解力的架構等問題，而這些皆源自於二十世紀末的人文科學領域中，由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引領的「哥白尼革命」(Copernican revolution)影響(參見第二章)。

在媒介研究的鼎盛時期，只有少數理論家撰寫著作以關注形式和媒介的問題。像是麥克魯漢(Marshall McLuhan)、迪柏(Guy Debord)和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sup>j</sup>。雖然「影像」(the image)和論述的內容很吸引人，但這也隱蔽了許多傳遞這些影像、論述內容的關係形式。傳播研究內的一些領域，尤其是實證及行為主義觀點<sup>k</sup>認為在兩個發話端之間存在著互動的過程。傳播的雙向模式在於分析傳送者(sender)、接收者(receiver)以及訊息(message)之間的關係(參見第二章)。然而，相對之下，

---

l: 例如，哈特利(John Hartley, 1992a)擁護一種基本的理論性原則，他認為「傳播是文本性的，而非行為的」(p. 14)。哈特利提出另一項原則為「傳播是社會的，而非個人的」。哈特利將所有種類的傳播合併為廣播，有鑒於廣播分析的倍增(在此提到的哈特利著作是有關於電視)，他特別著重文本。我修改了哈特利的原則，認為傳播中文本或行為的地位，將會視媒介的結構而定。我同意哈特利的第二項原則，但是，傳播的社會本質及傳播目的皆與媒介有關。我們知道，社會並非可操弄的抽象概念，不是相對於個人的概念，傳播目的也不是個人化的。

j: 我會談到這個，是因為它的不均衡，並非不同取徑而無從比較。媒介研究已發展成寇納(John Corner, 1997)所說的，是一種「知識的問題」(knowledge problem)。

k: 實證主義和行為主義嚴格地區分人類和技術，有鑑於此，它們皆以工具主義的觀點來看待科技；例如，實證主義的研究方法傾向於談論科技的「使用」，「使用者觀點」，或是理性選擇的觀點。在此，科技幾乎變成一種看得見、摸得到的成分。例如，在網際網路上，我們使用滑鼠來作選擇。此外，行為主義者否認個人是完全消極的，他們希望檢視科技對個人(少數是社會)行為所造成的影響。

傳播媒介(網路和廣播)實質結構的社會意涵卻較不受重視(除了上述以外)。

自一九九〇年代早期以來，網際網路開始劇烈成長後的幾年中，分析傳播媒介的社會意涵在理論上的必要性變得更加重要，也是不可避免的。在此關鍵性的轉捩點，這樣的改變使我們有機會瞭解到媒介整合面的重要性並不比語言學派來的低。媒介研究就好像一直在等待著歷史發展的客體：網際網路，以採取適切的觀點，將傳播視為一種媒介來理解<sup>L</sup>。

歷經理論的轉變時期之後，產生了一些結果。首先，一些早期的媒介理論家如麥克魯漢、殷尼斯，開始(現在仍然持續著)一再地提出主張(參見第三章)。第二，新的改變反映出對於「形式和內容」之間區別的重視，像是傳播的「儀式」相對於傳播的傳送觀點(transmission accounts of communication)。將傳播理解為一種「儀式」(ritual)，這是跳脫傳播「傳送」觀點主導地位的徹底典範轉移，大量滲透入二十世紀的傳播理論中。傳播的儀式觀點主張，個人之間並非為了自身興趣或累積知識而進行資訊的交換，而是為了獲得交流、共同性和親密關係(參見 Carey, 1989)。另一方面，傳播的傳送模式則將傳播視為一種工具性的行為，個人傳送、接收訊息的行為大多是受理性的控制。

佔據著傳播理論主導地位的傳播傳送模式同時受到暗示性、明確性的質疑與批判，語言哲學家抨擊本體主義者和本質主義者，認為此模式基本上便存在著「邏各斯中心主義」(logocentric)和「語音中心主義」(phonocentric)(參見 Wittgenstein, Lyotard, Kristeva, Lacan)。例如德希達(Jacques Derrida)的論述，他批評以下概念：語言提供一個穩固的意義體系，使得任何一

---

L: 這並不是指「媒介研究近乎死亡」，就像高烈(Gauntlett)極端地主張，歡慶著「長壽的新媒介研究」的到來(Gauntlett, 2000: 3)。的確，傳統媒介可以透過新的方式來看待。

個特定的傳播工作得以進行。以此方式來將傳播描繪成「一種負責從某主體至另一主體之間傳遞的傳送過程，一種對於指涉物的認同」(Derrida, 1981: 23)，使所有抽象物產生意義的語言衍生，並視個人的傳播動機為理性、擁有自主性。德希達嚴厲地批評上述假設，而我們再回過頭來看這些假設，試著瞭解德希達為何斷言它們與傳播情境中的變化緊密結合。同時，我們也看看德希達的著作如何慶賀第二媒介時代的到來，由於近代的顯著開放性，揭示了「在場的形上學」(metaphysics of presence)，而能夠在更有限(但不會是完全)的情境框架之下操控廣播形式的傳播。

然而，一般來說，哲學中本質主義的「解構派」(deconstructions)相當具有啟發性，但他們的主張同時也過分地誇大。本書不僅檢視文本中的意義運作，還將檢視傳播科技的基本結構，以瞭解這些聯結關係、社會整合、社群的形式。這些實質上的轉變也為本質主義帶來挑戰，使本質主義更難以支持。因此，傳播理論中，不僅「媒介研究」典範受到挑戰，也必須說明理論該如何重新鑄造。同時，媒介研究是一個與第一媒介時代相關的理論性領域，也是「內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的先驅，並與此事實相關：在高度資本主義社會中，廣播和現代社會景觀本質整合成社會組織。

## 7 參、第一與第二媒介時代：歷史性的差異

一九九〇年代中期，大量相關的文獻出現，使「第二媒介時代」的概念獲得發展。其中對於網際網路文化的興起，以及隨之而來廣播或媒介文化的死亡，有些人抱持著烏托邦主義，有些人則投以悲觀態度。一九九五年，波斯特(Mark Poster)的出版書籍《第二媒介時代》(The Second Media Age)檢閱了這些

文獻，對於開放的新科技社會發展前景，透露出一種迷戀的態度，並鼓勵我們反過來重新思考舊科技對社會進程的意義。但是，一九八〇年代期間，第二媒介時代的概念仍處於初期發展的狀態，在資訊社會的傳統概念裡，它只是在某些方面上與「媒介社會」有所差異。的確，「媒介研究」這門學科隨著研究對象不斷地轉變、亦加不確定的情況下，也變得更模糊不清。傳統上，「媒介」這個名詞主要指的是「大眾媒介」的概念，美國「大眾傳播」學門中尤其重視此概念。但是，媒介研究(和大眾傳播研究)不能再將自己侷限於傳統的廣播形式之中。當代大學教育課程中，傳播研究還包括更多種類的學識：能夠使第一和第二媒介時代之間的差異，作出最好的調和。

然而，我認為這兩個時代之間的形式化分水嶺，應該是在一九九〇年代早期，由於國內網際網路興起而產生的巨大驅動力。一九九〇年代開始，我們可在書店架上看見許多相關書籍，從科技指南、互動性電腦，以及闡述網際網路將會對我們的日常生活帶來影響的文獻，各種書籍都有。一九九〇年代中期，也出現了大量的新聞著作，包括瑞格德(Howard Rheingold, 1994)的《虛擬社群》(The Virtual Community)、吉爾德(George Gilder, 1994)的《電視時代後的生活》(Life After Television)、尼葛羅龐蒂(Nicholas Negroponte, 1995)的《數位革命》(Being Digital)，以及大企業家比爾蓋茲(Bill Gates, 1996)的《擁抱未來》(The Road Ahead)。此外，還有其它一些較受爭議的文獻，如波斯特的著作、特寇(Sherry Turkle, 1995)的《虛擬化身：網路世代的身份認同》(Life on the Screen: Identity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雷維(Pierre Levy, 2001)的《網絡空間》(Cyberculture)，以及波特(David Porter, 1997)的《網路文化》(Internet Culture)。一九九〇年代晚期，這類書籍的讀者數量達到最高峰(Bell and Kennedy, 2000; Gauntlett, 2000; Lievrouw and Livingstone, 2002; Wardrip-Fruin and Montfort, 2003)。在我們的預料之內，「新媒介

時代」朝向充滿著大量媒介政策相關文獻的特色而發展，廣播快速地沒落，而數位化媒介的管制顯示出媒介政策所面臨的挑戰(例子參見 Steemers, [1996] 2000)。同時，高爾(Al Gore)宣示「新雅典民主時代」(new Athenian age of democracy)的來臨，英國政治顧問也提出第三條路(Third Way)的策略<sup>M</sup>。一九九〇年代末期，很快地，第二媒介時代的論點成為正統學說，進入新媒介思考的主流。

例如在澳洲，巴爾(Trevor Barr)關於網際網路的報導：電子遊牧民族：網際網路典範 (Electronic Nomads: Internet as Paradigm)(Barr, 2000)中提到：「近年來，網際網路在全球各地突飛猛進地成長，其擁護者熱切地支持，同時卻也對於未解決問題感到困惑，我們可將網際網路視為一種典範的轉移」(Barr, 2000:117)。在新傳播時代開始之際，我們都想知道，網際網路將會帶來「希望或危機」(Barr, 2000: 144)，巴爾繼續談到：

比起傳統媒介制式化的所有權及控制權，網際網路的不受限制，是它與生俱來的一項優點：過去幾十年中，報章雜誌和廣播等主流媒體都具有一項特質：它們擁有相當明確的內容或形式「守門人」(gatekeepers)，相對於此，網際網路則無。每一位接觸網際網路的人都能夠成為具有自主性的創作者，傳達他們自身的感受給其他遍佈全球各地的網路使用者。

即使如同柯司特(Manuel Castells, 1996)這樣非專業的媒介思想家也採納一種觀點，認為第二時代媒介的論點是對於麥克魯漢的批判。有線電視和數位電視的開展，使閱聽眾能擁有更

---

<sup>M</sup>高爾對於網際網路和人民科技社區主義(techno-communitarianism)的宣言，英國新工黨(New Labour)幕僚對此宣言的評價，參見羅賓斯與威伯斯特(Robins and Webster, 1999: 229-31)的著作。

加個人化、互動性的媒介文化：「閱聽眾接收越來越多不同的素材，建構出世界各地人們的形象。麥克魯漢星系(McLuhan Galaxy，譯者按：由電視所主導的傳播系統)只是一個單向傳播、非互動的世界」(Castells, 1996: 341)。

根據柯司特的說法，「互動性社會」取代了既有世界，象徵「多媒體」(multi-media)這個轉變時代的來臨，帶來「以數位化、網路整合的多樣性傳播模式為基礎的新傳播系統」(Castells, 1996: 374)。柯司特認為只有在整合系統中，才能使訊息能夠傳遞、社會化：除此之外，所有其它訊息，則只能成為個人創作，或是被社會邊緣化的面對面次文化。從社會的角度來看，「以電子化為基礎的傳播(印刷、視聽，或是電腦中介的)才能算是傳播」(Castells, 1996: 374)。

柯司特提到，雖然非電子化為基礎的傳播可能仍然存在，但正逐漸地失去其原有的地位。這使得「互動性社會」成為一個相當重要的議題。當世界被二分為「正在互動」(interacting)和「過去的互動」(interacted)時：

進入這種體制的代價，就是必須適應它的邏輯、語言、參與的條件，以及其製碼和解碼。這也是為什麼它造成許多社會影響的原因。為了適應新的體制，我們必須發展出多節點、水平式的網絡傳播，取代集中化發送的多媒體系統。例如隨選視訊(video-on demand)系統就是如此(Castells, 1996: 374)。

一九九〇年代早期至中期，這些特點並沒有改變。第二媒介時代早期的一些思想家：波斯特、吉爾德、尼葛羅龐蒂和雷維等人的表述方法相當一致，他們認為網際網路(以及一般的互動科技)與先前的社會連結形式完全不同。對他們來說，網際網路是一種提供救贖的管道，據稱能將個體從集中化的資訊

體制中解放出來，例如電視，即受到所屬國家或組織的掌控。早在一九八九年，吉爾德(George Gilder, 1994)便預言了電視的沒落，以及通訊型電腦(telecomputer)的誕生，他更以此預言感到自豪(Gilder, 1994: 101)。以電視來說，「陰極射線管顯示器」(the Cathode Ray Tube)和無線廣播技術成為形構媒介普及化國家的工具。某些「從/屬」(master-slave)結構的廣播中心，製作節目提供給數百萬被動的接收者或「呆滯的終端」(Gilder, 1994: 26)，相反地，比起大眾的文化與被動特質，電腦時代中更豐富的互動科技，將會使個人主義更為高漲，並增加創造力(Gilder, 1994: 23, 32)。對尼葛羅龐蒂而言，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是他所稱的「後資訊時代」(post-information age)的一項主要特色。相較於同質化的廣播通訊結構，網際網路提供另一種選擇，讓人能夠幾近不受限制、自由地搜尋資訊，與其他數千位擁有相同權利的個體、自發性組成的虛擬社群聯繫。

對雷維(Levy, 2001)來說，網際網路是一個「無邊界的世界」(Levy, 2001: 91-103)，是創造知識的地方。網絡空間的成長，使其變得更加「全球化」，世界上的資訊更是無以數計(Levy, 2001: 91)。其中一個最重要的面向是，網際網路提供大眾媒介之外的替代性選擇，將有系統的節目資訊從中心點傳送給大量匿名、被動且孤立的接收者(Levy, 2001: 223) <sup>9</sup>

對於數以千計接近使用網際網路的消費者來說，這種去中心化的聯結模式是很有魅力的。網際網路引人入勝的景觀，戰

---

<sup>9</sup> 有關「去中心化」，參見本原文書第 157-9 頁。對尼葛羅龐蒂而言，後資訊時代指的是後廣播時代，閱聽人是無所不在的(Negroponte, 164)。在此時代中，資訊非常個人化，而非同質化的大量傳送。

<sup>0</sup> 此外，「網絡空間」並非以中心點到分支點(hub-and-spoke)的傳遞模式為基礎，而是有許多共享空間，在這些空間內，每個人都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見」(Levy, 2001: 223-4)。

勝了專橫於第一媒介時代的廣播媒介。廣播媒介的特點在於一對多的關係、單向、集中化的傳播，它們是一種(在地理上)破碎、不連續的非互動社群，也是同質化的文化體制。

波斯特和瑞格德(本書將在第三章徹底的談論他們)認為網絡空間的關係結構展現出更新、更廣泛的電子化公共領域，挑戰了工具性、被壟斷集中控制的媒介類型，以及隨之而來廣播(瑞格德)和文化產業(波斯特)標準化、規則化的產製品。此觀點在第二媒介時代的文獻中屹立不搖，但事實上，網際網路本身成為一個壟斷資本的待開發領域 P

比起廣播形式的媒介，網際網路可說提供了自由政治表述的可能性，以及不受會面限制的視訊會議。不論是在技術、政治或社會等面向，限制皆大幅減少。網際網路最為眾所皆知的特色，就是其去中心化的技術結構。一九六〇年代，由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所發展出的技術網絡系統，即以「封包交換」(packet-switching)為基礎，將網際網路上的各種訊息、影像、聲音，透過多線路以分段方式傳送。這種傳送原理是蘭德公司對付資料庫中資訊可能遭受軍事攻擊的解決方案。資訊不斷地處於變動之中，在可判讀與不可判讀之間游移，由於資訊本身的能動性，使其變得模糊而不確定。因此，不論是在技術方面(駭客或程式設計師)，或者政治方面(國家或組織)，網際網路都無法受到控制。Q 在二十世紀，廣播機構受到政府和組織的掌控，是此時期的特色。許多人認為網際網路代表一種不

---

P: 一些研究指出，纏繞著舊媒體的「巨人症」(gigantism，譯者按：此指媒體的壟斷、集中化)，目前也同樣支配著新媒體。即使對於網際網路，有著不能毀壞的多樣性的迷思，事實上網絡空間也難逃被壟斷的趨勢。一九九九年，網路上所有網站的造訪次數，共有百分之六十是屬於一百一十家公司。直到二〇〇一年，十四家公司獲得多數使用者的造訪，其中有百分之五十的造訪次數是屬於四家公司(Buzzard, 2003: 207)。

Q 參見第三章由瓊(Jones, 1995: 8)所提供的實用性列表，它指出許多網際網路的技術面細節。

受限制的科技媒介，並重新建構出一個「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如表 1.1 所提及，第二代媒介實現公共領域，重新建構出雙向的互惠關係，擺脫廣播的單向傳播。此外，廣播媒介使用者構成(也被認為是)一群同質且不明確的大眾，而在網際網路上，傳播者的個體性得以實現。

在歷史類型學中，互動性的時代(age)或年代(era)：數位時代，也就是網際網路時代或是第二媒介時代，幾乎與大眾媒介的黑暗時期形成對比。R 盲目地崇拜任何與舊科技不同的新科技，這是一種歷史主義的論點。S

不論是關注公眾選擇、自由言論的自由主義者(例如 Gilder, 1994; Negroponte, 1994; Rheingold, 1994)，或在馬克思主義框架之下運作的機構(後法蘭克福學派(post-Frankfurt School))，或者關注「地下莖」(rhizome，譯者按：此為來自於植物學的隱喻，是一種新的思維方式。例如網路，在任一網頁遊走都可回到網站主頁，由主架構將每個多元文化枝葉連接起來，即為地下莖的概念)的概念

R 就像(Silverstone, 1999)所觀察到的：

互動性的新意識型態 是 強調我們延伸掌控範圍的能力，透過我們自己的選擇，決定要消費些什麼，同時也決定消費的時間和方式。值得喝采的是，我們不僅擺脫一對多的廣播世紀，越來越多「孩童化」(infantilization)的被動閱聽人也向前進步。這是一段有關千禧年主義(millennialism)的描述，這些都是新時代中烏托邦的思想，在此人們被賦予權力：人們得以使用並掌控滑鼠和鍵盤(Silverstone, 1999: 95)。

S: 近年來某些人對於此正統論述提出修正，批判「資訊革命」(information revolution)是一種誇大不實的說法，是崇尚新事物、現代化的迷思。波爾特和古魯辛(Bolter and Grusin, 1999)認為新媒介對舊媒介做「矯正」(remediation)的過程(例如，電視矯正電影，或者攝影矯正繪畫)，並不只是全然地走向數位或後廣播時代。對溫斯頓(Winston, 1998)而言，「革命」一詞被錯誤運用在「新媒介」(New Media)之上，他認為傳播工具目前轉變的速度，確實比先前時期科技傳布、改變的速度還要慢。「資訊革命」可說是一種幻覺，一種誇飾的議題，也是因為不瞭解科技而做出的陳述(Winston, 1998: 2)。

表 1.1：第一與第二代媒介的歷史性差異

第一代媒介(廣播)	第二代媒介(互動)
集中(少對多的傳播)	去中心化(多對多的傳播)
單向傳播	雙向傳播
多數受政黨控制	擺脫政黨控制
用來形塑階級、不平等的政黨工具	民主化：促進公民權的普及化
使用者是破碎的，是一群烏合之眾	參與者被認為擁有其自身的個體性
影響意識	影響個體在空間、時間上的體驗

〔例如德勒茲(Deleuze)〕，或沈默多數(silent majority)打敗擬仿機器(simulation machine) (Baudrillard, 1982)的後現代主義，對於廣播的批評明顯地具有一致性 丁

網際網路的推崇者主張，網路擁有民主、救贖性的優點，透過其互動性，得以重新建立失落的社群。同時，也可能帶來新類型的社群，比起近代受國家管控的社群形式擁有更多優點。引用波斯特(Poster, 1997)的論述，他以廣泛的後現代主義 11 者的觀點出發，認為網際網路意味著主體建構的「民主化」，因為「論述行為已與過去面對面的傳播不同，不再僅止於單向傳播，也不會因性別、種族而受限制」(Poster, 1997: 222)。網際網路與中心化(centralized)、線性傳播(unilinear communication)的廣播媒介截然不同：網際網路的神奇之處在於，科技將所有文化行為、象徵記號都歸納於同一種形式，掌握在所有參與者的手中。言論、出版、電影製作、無線廣播、電視廣播等機制，也就是「文化產製」(cultural production)的機構，都徹底的去中心化(Poster, 1997: 222) 卩

T: 關於此批評，在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對 傳播裝置：無線電廣播 (the radio as an apparatus of communication, [1932] 2003)的短篇回應中，有更多的描述。

u 許多人贊同這項主張，而廣播公司本身也對此議題相當感興趣。里南(Geoff Lealand, 1999)認為一直以來，美國這方面的研究都是由媒

此外，網際網路的電子化產製空間取代了制度性的習慣，打破民族、性別和種族地位的階級(參見 Poster, 2000: 148-70)。從前被排除在公共領域之外、與當權相對的主體性也得以建構。網際網路固有的去中心化形式，彷彿宣告它最顯著的特性：允許衝突或相似的意義、符號同時並存，代表當局權威的意義，也就是邏各斯(logos)或崇高的敘事，已經無法繼續維持。波斯特認為網際網路推翻自中古世紀開始就深深影響歐洲制度化生活模式的理性、邏各斯中心主義形式的政治權威。當網絡空間本身具有更富變化、流動的形式，國家體制中的公共領域也被擴大，而同時也暗中破壞中央集權的掌控型態。這樣的擴張在某些部分因為來自於國家的憂慮而結束，擔心資訊加密是否能對抗網絡恐怖行動，以及傳播科技使用的管制。

#### 肆、廣播媒介與網路媒介： 歷史類型學的問題

事實上，我們正邁向一個後廣播社會，許多記者和網絡理論學家同樣認為我們面臨著網際網路逐漸侵蝕廣播媒體的現象。關鍵性技術與整個傳播時代緊密關聯的概念：即印刷技術、廣播技術或電腦互動，能用來區分第一和第二媒介時代。這樣的區分並非絕對，而是相對的，第二媒介時代的獨特之處在於互動性，這是線性的廣播媒體所缺乏的。

就實證層面而言，許多數據資料印證兩個時代是有所區別的，這些資料顯示互動式的傳播資訊科技如此快速的興起，以

---

介紹組織本身來執行，它們委託社會學家、傳播分析專家來研究組織的去中心化，這也是為了去除更多管制規定的策略之一。

致於逐漸侵蝕著廣播媒體的空間。然而，立刻隨之要面臨的兩個問題，使得兩個時代在技術發展上的創新，以及使用這些科技的所有消費者之間緊密結合。 12

首先，所有擁護第二媒介時代的論文忽略了第一與第二媒介時代之間的連續性，我的主張可能搖動了許多這些文章中社會和政治性的論述，但並非我們要全然否認廣播、互動性媒介之間的差異。我們應該看看第四、第五章，傳播整合模式的形式分析中，可發現兩者之間仍然存在無可避免的差異性。

但是，第二媒介時代的論述並不認為互動性傳播資訊科技與廣播之間存有共同之處，他們認為第二代媒介較優越，也不承認在某種程度上，第二代媒介是依靠著廣播媒介而生。在本書第四章及第六章將會談到這裡所說的連續性，以及傳播資訊科技的走向。不論是互動式或廣播媒介，都是以都市化技術的相似邏輯運作著。此外，兩者在經濟需求上相輔相成，而非明顯區隔。從經濟觀點來看，我們可看出網際網路和電視，網絡媒體和廣播媒體是如何地「需要」彼此。

第二個難題在於，第二媒介時代理論家將兩個時代視為一直線，以一些技術上的重大發展來作出歷史性的區隔。也就是說，傳播的發展不是科技、政治、社會和經濟環境之間的遞迴關係，而完全由科技本身來決定（這是一種科技決定論的傾向），必須區分出傳播環境的結構（去中心化、中心化、一對多、多對多），以及環境中的技術形式。廣播能像互動性媒介那樣具有互動性，互動媒介也能如此幫助廣播媒介。

電視、報紙、廣播、網際網路和電話，提供了廣播和互動媒介的要素，只是它們常被認為是不同的。在不同的具體層面上，有著不同的「科技社會」（techono-social）關係。

廣播可以成為任何公共展演、演說的形式，能夠選擇是否以科技作延伸。例如，一場演講可以選擇是否使用麥克風。互動也能夠透過科技延伸（網路網路）或者直接面對面來進行。從

科技延伸形式的觀點來看，我們可以說，不同形式結構的媒介是共同存在的。因此，網際網路的重要性並非是比其它傳播管道擁有更大力量，而是提供了一個涵蓋廣播和互動性媒介「次媒體」(sub-media)的平台。舒茲(Tanjev Schultz)曾觀察到：「在網路上的一些網站變得比其它網站還要受歡迎，它們就像網際網路這個平台上的『大眾媒體』，提供各種傳播媒介和類型」(Schultz, 2000: 208)。這些網站也是新聞報紙等專業化設立媒介的反映，只是將出版或廣播業原本已有的內容稍作增進(參見 Schultz, 2000: 209)。

因此，科技本身的價值在於，帶來直接溝通的管道。廣播的容載能力決定於技術形式的範疇：從電話到書寫。同時，在電腦中介情境之下，也能如同電影和電視一般模擬在場。

這些例子中，許多都具有重要的歷史性，但也使得關於「匯流」(convergence)的新媒介論述有理論上的瑕疵。無論舊或新科技中，匯流現象已經過一段時日，而兩者主要透過彼此在技術性延伸一般社會關係中產生相互關係。

然而，在新媒介匯流的現象中，主要與「數位化」(digitalization)有關。回顧媒介與電訊傳播技術的歷史可發現，數位化並非廣播和網路結構(network architectures)之間匯流的必要條件。匯流可促進開放結構，從到個人網頁都得以被接觸，但長時間累積下的需求卻是個人化。數位化並不能帶來比廣播更好的互動性和網絡。此外，這些擁護新媒介時代的論文認為在當代傳播環境中，科技比任何人類學方面的理解還重要，我們將會在第三章提到。

---

然而，這並不是指網際網路應該被視為如同電視一般地產製相同的認知領域。例如，有些人嘗試將網際網路描述成擁有百萬個頻道的電視或廣播。問題在於，頻道越多傳佈的力量就越微弱，任何訊息或人所組成的「內容」，它們曝光時間被稀釋，在網路網路上，要出名顯得比較困難。

為了釐清這些由新媒介歷史相對論(new media historicism)所引發的困惑，我認為「第二媒介時代」的特點並非新世代的轉移，而在於一種傳播整合的層次，在「第二媒介時代」中沒有新事物，而是所有廣播、網際網路等傳播媒介的共存。溫斯頓(Brian Winston, 1998)對於主要傳播媒介，從電話到網際網路歷史的介紹中，也指出這項事實。溫斯頓談到，若說新科技媒介本身必定擁有與「舊」媒介不同的美學和社會特質，這樣的說法其實是一種源於新事物崇拜的錯誤觀念。

溫斯頓並指出，在本世紀，比起科技因素，經濟因素是如何更加限制了電纜傳播的頻寬。此外，政治及意識型態因素將廣播視為一種「社會力量的集中化」(Winston, 1998: 307)，也成為限制電纜發展的原因。雖然無線廣播盛行，「電纜仍未消逝」，「早期的廣播和電視網絡都屬於電纜，越洋電話線纜也隨著國際電訊傳播衛星系統同步持續發展」(Winston, 1998: 305)。對溫斯頓而言，廣播網絡和電訊傳播同樣老舊，而對於電腦連結潛能的主張也只是相對誇大的言論。

無論如何，由於文化、歷史因素，網際網路的到來只是「將網絡視為媒介」這種概念的「制度化」。如此一來，也讓一些理論家開始重新思考廣播這個媒介。如果「第二媒介時代」用來暗示媒介環境中的文化變遷，那麼這個詞彙是很有用處的，因為目前看來，自從網際網路傳播嶄露頭角，傳播的網絡結構更顯得重要。如同本書談到的，從紀錄片節目到真人實境類型節目，都是轉變的一部分。在某種程度上，廣播媒介也提供了傳播者之間的網絡：一種儀式性的網絡，而網際網路的興起則是將這種網絡具體、明確化。

媒介分析者將個人化科技與傳播特質緊密相連的原因之一在於，如此傳播資訊科技才能被體驗，因此媒介與消費者的科技通道之間的關係相當重要，而通道也就是我們過去所說的一種主動或被動的關係：分別以網際網路和電視為典型代表。

吉爾德(George Gilder, 1993)認為「電視忽略了一項事實：人們並非天生的沙發馬鈴薯；必須給予他們回饋、互動的機會」。在互動的「介面」(interface)層次上來說，或許這指的是消費者對於遙控器的掌控，而與掌控滑鼠的積極相較之下較為被動。

以上描述網際網路消費者與電視消費者之間的對立，顯示出控制已經超越了互動。對於掌控這樣錯誤的觀念就像是把科技看作是控制的「再製」(reproduction)(Jones, 1995)，生活上再製的形式是以低度科技的交流方式組成，例如面對面和書寫。網際網路被視為是一種「使用性科技」(use-technology)，它是相當工具性的，以更科技化、強大的形式附屬於社會連結之下。理想上，個人是參與連結的主體，主體性在某些方面上得以擴大、延伸。另一方面，若說電視消費者的主體性得以擴大，這樣的說法較有爭議，但我們還是能自己選擇接收的頻道、訊息，可以用科技延伸的方式參與。

然而，在傳播資訊科技的情境下，主動與被動之間的差異得以緩和，傳播資訊科技被認為是再製的科技(工具，或延伸的手段)，當它被賦予再製技術的角色時，就變得相當微弱(如同網絡和視訊會議) <sup>W</sup> 再製的傳播資訊科技概念，意味著將資訊媒介視為建構整體新行為與認同形式環境的思考方式(參見 Meyrowitz, 1999; Poster, 1997) <sup>X</sup>，也就是說，他們並不只是再製既存的社會關係，而是帶來嶄新的關係。

---

<sup>W</sup> 強調傳播資訊科技是產製「新」社會關係的科技，這種論點可視為是「複雜度理論」(complexity theory)的先驅：此理論認為社會(或自然界)現象間因果互動連結出現的量和速度變得相當複雜、混亂，就像產製新事物，以及有時混亂的行為和特性(將此現象的後現代意涵運用在傳播過程，參見 Kroger and Weinstein, 1994)。

<sup>X</sup> 沒有任何事物比巨大的世代鴻溝還要更壯觀。這條鴻溝存在於青少年和成人之間，尤其在學校教室。在教育類期刊中，關於世代鴻溝的文獻數量迅速增加(參見 Downes and Fatouros, 1995; Green and Bigum, 1993; Holmes and Russell, 1999; Russell and Holmes, 1996)。

## 伍、互動與整合

傳播媒介 是廣闊的社會隱喻，它不但傳遞資訊，也決定了什麼是知識；它使我們適應於整個世界，並告訴我們存在於世界上的各種事物(Carey, 1972: 285)。

主動和被動，以及媒介、非媒介傳播之間的差異在於面對面或類比傳輸的互動模式。在傳播理論中，傳播模式能一直受到重視，是因為「互動」已經普遍成為傳播的基本要素，是許多傳播形成的原因。

此外，我們也必須思考互動和整合之間的區別。雖然兩者具有差異，互動仍然相當重要，但我們必須認清，所有具體的互動都發生在傳播整合的主流架構脈絡中：透過抽象的傳播「儀式」進行著(參見第五章)。一些關於整合的論文不認為對於觀察互動類型(人際或其它更廣泛的種類) 的傳播實證研究正在減少。例如，部落社會中，面對面關係、肢體對於傳播儀式的重要性，深深影響著整個社會。從儀式的觀點來看，互動是可以觀察的，它是從社會聯繫的形式(例如世界上各種動物、客體的人格化)中發展而來。在環境之下的個人並非不斷進行同樣的面對面互動，但即使互動未發生，面對面本身就是一種文化型態的核心，進而構成其它形式的互動。例如，遠距離形式的互動是從面對面的「影像」轉變而來。如果我們將傳播科技視為一種社會聯繫的不同方法，在現代媒介滲透的社會中，即使我們並非正在看電視、使用網際網路，這些媒介仍建構我們的生活。這並不是說我們不需要面對面關係，或是沉溺

---

Y: 例如，最典型的就像人類學，以及傳播研究中的行為傳統(參見 Finnegan, 2002)。

於科技中介的互動，而是指我們「透過」主流的媒介或社會交換來經營面對面關係。這裡有一些例子：

- 16
- 當收看肥皂劇，我們通常就是在觀看劇中角色之間大量的面對面互動。在這些收視群之中，收視的同時，我們放棄自己與他人的面對面互動。對於面對面互動的需求，我們或許能透過電視螢幕來達成。
  - 研究顯示，城市居民擁有更多面對面接觸的管道，他們使用電話的頻率比居住在鄉村地區的人們還要高。
  - 關於網際網路關係的研究顯示，匿名互動者更可能洩漏私密訊息，比起實體生活中的陌生人，在網路上，人際間彷彿擁有長時間的面對面關係。
  - 網路溝通禮節中，最常見的一項就是使用「情緒臉譜」(emoticons，譯者按：一種由標點符號組成、用來傳達情感的符號，藉此營造出輕鬆友好的氣氛)，它是一種手勢、動作溝通的替代方式。

科技性延伸傳播形式顯著擴展而成為整合的主要模式，讓我們在某種程度上能夠藉由傳播科技形式來實現面對面社群的理想。相反地，我們可能盲目崇拜傳播科技，認為它能夠帶來立即互動和虛擬形式的社群(虛擬真實的夢想)。以上兩種對於當代媒介整合的反動，在逐步多樣化發展的第二媒介時代文獻以及重視互動概念的網絡研究論述中也很常見。

這類文獻通常以社會互動模式為架構，例如面對面互動被其它源自於延伸性的傳播形式所取代，以某種方式將個人與自然狀態下的面對面互動區隔。這個強大的模式啟發了懷舊式的傳播學者們，例如瑞格德主張，資訊社會中的個體們都在尋找已失去的事物：面對面。此外，此模式也帶給後現代主義者一些啟示，例如瓜塔里(Felix Guattari)提出這樣的觀點：面對面關

係已經不再重要，但他並不為此感到哀傷，相反地，瓜塔里認為我們應該迎接後個體傳播網絡的到來，並瞭解主體一直是種虛構的事物(參見 Guattari, 1986)。但我認為這種消極的理論誤認為面對面在歷史上已經完全消逝，也就是說，如果將面對面視為一種社會整合的形式，而非互動形式，那麼我認為這些立場就變得站不住腳。從人類學觀點來看，資訊社會中，面對面是連繫的一種重要模式，而網際網路則成為其中一項強大的聯繫模式，但僅有其中任何一種卻不能達成完美的整合。

另一方面，整合與「儀式」模式(ritual model)探討傳播連結的背景類型，這些背景造成不同階層的集會(agoras)參與，可能是公共、制度、虛擬的，都是獨立的個體傳播行為。而關鍵點就在於「獨立性」。我們必須瞭解，當我們並非在看電視或收聽廣播時，廣播的傳播環境仍然框架個體生活。我們可以透過電話得到類似面對面的感受，相反的，我們進行實體的面對面傳播行為，也不能脫離電話或網際網路，因為它們都是傳播的延伸形式，傳遞著面對面的體驗。這項後來的論點中，主流連結或媒介環境之下，既存群體中的個人以社會性整合至其它的互動層次，而這是本書持續探究的其中一項嶄新議題。

為深入探討此議題，本書將描述第一與第二媒介時代之間的不同，進一步瞭解廣播媒介和互動性網絡媒介彼此之間如何產生關聯，它們又與社會再製存在何種關係。